

7 次“纠冤”机会何以全部错失

据《东方早报》报道,2003 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两名被告人一审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二审改判为死缓和 15 年徒刑,服刑已近 10 载。今年 3 月 26 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两人无罪。

冤屈者沉冤得雪,欣慰之余,更觉沉重。这是一起并不复杂、否定性证据十分明显的案件,如媒体所总结,曾有 7 次纠错机会,却一一被错失,正义整整迟到了 10 年。

冤案的发生和平反,都具有太多的相似性。在这起案件中,侦查人员违法办案、非法取证的问题同样昭然若揭:无辜的叔侄俩,竟能作出貌似“真实”的有罪供述和指认现场笔录,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指供、诱供问题?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是何原因?警方跨省调动的“狱侦耳目”袁连芳用暴力、威胁等方法逼取所谓“认罪”材料,并作伪证,是否系受警方指使操纵?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被虚置,不仅表现在侦查阶段,同样存在于起诉和审判阶段。这起案件,在证据上疑点重重,除了两被告人的供述和神秘证人袁连芳的证言外,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而且,被害人指甲里检出的 DNA 混合物,一开始就排除了两被告人。如此“疑案”竟通过了起诉、一审、二审的层层审查,最终以“疑罪从轻”收场。

男子砍伤学生再敲校园安保警钟

□ 魏英杰

3 月 27 日下午,上海奉贤区突发一起男子持菜刀在小学门口砍杀多名路人事件。据悉,犯罪嫌疑人臧某因家庭纠纷,杀害居民楼中两名女性亲属后,又来到附近的金汇小学门口,砍伤了 11 名路人。此时正值小学放学,受伤人员中 6 人为未成年人。

目前,尚不知臧某为何杀害亲属,又为何到小学门口乱砍人。由于学校正在居民楼附近,因此还不能断定嫌犯就是冲着小学生来的。但其在居民楼中行凶后,挥刀砍向路人,若非精神受刺激,不排除有报复社会动机。一个人哪来那么大仇恨,在杀人泄愤后还挥刀指向无辜路人,这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尤其让人牵挂的是 6 名受伤的小孩。也许他们并不全是附近小学的学生,但应该都是刚放学经过那里的小孩。他们无忧无虑地走在大路上,却遭此飞来横祸,这既让人愤怒,也让人深感担忧。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诊治,当地相关部门应迅速跟进,从医疗保障、心理抚慰等各方面照顾好伤者,使他们从这场无妄之灾中尽快恢复过来。

这起事件再次敲响了校园安保的警钟。虽不能确定臧某是否冲着学校而来,但近年来恶意到幼儿园、小学行凶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行凶者大多与学校没有任何利害冲突,

“三道杠”拦不住伪贫困生

□ 罗志华

成功申领助学金的“贫困生”,手里却拿着 iPhone,这种现象在高校屡见不鲜,助学金遭遇贫困生身份认定难题。近日,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机电学部建立了更严格精细的贫困生筛查程序,以“每月话费不得超 30 元,手机总值小于 500 元,电脑总价不得高于 3000 元”作为贫困生认定的“三道杠”,结束了沿用多年的“一纸贫困证明走天下”的局面。

想用“三道杠”来拦住伪贫困生,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作为一位铁了心与贫困生抢食的伪贫困生,“三道杠”的障碍太容易跨过,倒是真正的贫困生,容易受“三道杠”的影响,造成生活不便。

学校以学生的生活状态来界定其是否贫困,倒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但以三点作为硬指标,却难以反映生活的全部,伪贫困生要保住贫困的“帽子”,不超出“三道杠”的规定难度不大:可以不用好手机,但可以用好相机,可以少打电话,但不排除购买高档商品。生活由无数

这表明,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所应有的防错、纠错功能,在实践中往往被削弱。

防错、纠错机制失效,与当前公检法之间“重配合、轻制约”的制度设计和司法现状密切相关。公检法原本应是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关系,但在一些地方却演变成了“合作”关系。这种机制下,一旦警方通过刑讯逼供、诱供、指供,把“冤案”打造成“铁案”,输入司法流水线,就如同“滚石下坡”,一路闯关夺隘,直到作出有罪判决方止。

对于判决生效后的案件,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申诉和再审程序,以期通过事后救济发现和纠正冤错案件。但从实践看,这一事后纠错机制同样难以奏效。此案中的叔侄俩,服刑 8 年间不断申诉,却无人问津,甚至在法院的电脑里根本就没有录入。直至 2011 年 11 月,媒体曝光,及警方认定被害人指甲里检出的 DNA 与另一人吻合后,才引起浙江省委政法委重视,启动复查。

建设法治社会,需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但一些冤案,仍然在不断冲击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痛定思痛,需要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强化公检法之间的监督制约,并严格落实新刑事诉讼法,以严格、审慎的程序来防错、纠错,通过落实程序正义来避免和减少冤错案件。

(转载自《新京报》)

纯粹就是发泄仇恨、报复社会。此类行为已远远超越社会伦理底线,严重威胁到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危,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时刻保持警惕,从人员、设备与制度上加以严格防范。

目前,多数幼儿园、中小学均建立安保制度,配备相应人员与设备。相关环节到位了,心理防线却不能松懈。特别是,人员出入登记与安全巡防制度不可沦为虚设。只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才能沉着应对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保护好学校师生安全。别的事情或可分轻重缓急,校园安保却要时刻摆在首要位置。别的钱可以省,校园安保的钱却千万不能省。

臧某在校园附近行凶,还提醒了一点:这起事件或不在学校安保范围内发生,但仍在学生安保范畴内。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采取措施,延伸保护学生人身安全的“警戒线”,让孩子们平平安安地上学和放学。例如,学校要做好学生接送交接工作,让家长更加放心。又如,在学生上学、放学高峰期,加派警力在学校附近巡逻,发现异常问题及时介入。

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这起事件说明,必须依靠全社会积极参与、互相配合,才能为孩子们打造一道牢不可破的安全防线。

个类似“三道杠”所列的内容组成,除非“三道杠”变成三百甚至三千道杠,否则,学生跨杠轻而易举,只要用心去做,甚至对生活质量没有影响。

但另一方面,每月 30 元的话费,即使对于贫困生来讲,也许太少了一点。贫困不是宅在宿舍、减少交流的理由,贫困生也需要参与社会活动,有时候出于生活所迫,甚至更需要了解外面的信息,比如贫困生勤工俭学,甚至家有生病的父母需要时时联系和照顾,每月 30 元的话费,就会对他们造成不便。

贫困生往往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如人,内心有着他人没有的自卑感,做人相对本分老实,而伪贫困生既然有“伪”在先,说明处世更加灵活,同样的“三道杠”,对于伪贫困生也许不成障碍,反而真正的贫困生却受此影响。

学生动态的生活不能用固定的几个硬指标去衡量,只有通过更加科学的考察方法,以动态而全面的指标作为参考,才能掌握他们真实的情况,仅用“三道杠”来考察,难免以偏概全,实在不能算个好主意。



人造“最美”不能成为冷漠借口

□ 文/毛建国 图/王乃玲

“一名满头白发的老人盯着快餐店里的盒饭直流口水,被一名过路的女孩瞅见了,女孩当即买来盒饭,并单膝跪地将饭一口一口喂进老人的嘴里。”近日,一幅“深圳最美女孩”的照片在网上走红,可谁曾想到,这竟然是一则假新闻,目击者称其为摆拍。

“深圳最美女孩”出现时,一瞬间打动了多少人,想不到这竟然是假的。据称,其背后的策划者,和 2011 年《眼癌宝宝母亲跪爬,被“富家公子”戏弄》假报道的策划者,是同一个人。这种无底线的策划,这种无底线的网络推手,遭到再多的唾弃都不为过。

现在已经证明,“深圳最美女孩”是一个无底线的炒作。我们理性的做法,是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拒绝这种利用人们美好心灵、侮辱人们美好心灵的炒作。

“电子书包”,需要而不必依赖

□ 木须虫

上海不少中小学正在推行“电子书包”项目,iPad 平板电脑等引入课堂和教学。“电子课堂”添加了视频、动画,展示方便、形象,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但也有老师认为,知识的吸收性未必能胜过传统课堂,很多家长也更信赖传统课堂。

实际上,“电子书包”并非中国特色,目前全球已经有 50 余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试点推行“电子书包”。在我国,武汉、番禺等一些城市的中小学也在试点。从名称来看,“电子书包”并不是单纯的电子产品,核心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教育形式。一是让教育手段更多元,如视频、动画等方式,会使得教学更直观、更形象,孩子们更有兴趣;二是师生交流互动变得更快捷,如家庭学习和课堂学习可以实现即时的互动;三是让教师管理孩子学习变得更简便与高效。应该说,将信息技术运用到教育上,推动教育的革命,有重要意义,也是必然的趋势。

不过,“电子书包”不管功能如何强大,作用如何大,它终究只是教育和孩子学习的工具。作为技术手段的引入,不仅带来了现代与传统过渡的不适应,并且相对于教育本身来说,还有诸多的传统教育形式所没有的弊端。

有业内人士总结了五条:一是影响孩子视力。二是削弱传统文化影响力。无纸化让孩子少了传统学习的质感,书写减少弱化手写能力,会造成传统文化消失、民族文化断裂。三是过度网络依赖会影响学生识记能力。学习资料都能在手边电脑上迅速查到,

作。但没有必要因为这么一只“大苍蝇”,就开始变得冷漠起来。

当我们感觉心灵被“深圳最美女孩”所伤害时,更应该看到,在我们身边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美。包括在深圳,也有着众多的好人,每天也发生着众多的好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最美女孩”所骗?这或许有骗术高明的原因,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也正是因为人们普遍有爱心。这种爱心,才是社会的主流,才是我们的珍贵。

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一些人为了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做出一些无底线的炒作。炒作无底线,但我们有底线。如果因为这些无底线的炒作,而封闭心灵,而闭塞善行,我们也就失去了底线,社会也就失去了底线。我们的底线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不放过任何一点恶,同时释放每一点善。

并且学生或许会过度依赖“电子书包”的工具功能,不费吹灰之力,从而催生孩子的情性,这非常值得警惕。四是信息极丰富,教师在挑选作业习题时,或许会缺少尺度,增加作业量反而加重学生负担。五是电子书包不可避免地会加重一些贫困家庭经济负担。

坦率地讲,这些弊端或者担忧并非多余的。信息技术介入人们的生活,使得我们在得到丰富与便利的同时,不知不觉地丢失了很多。诸如,很多人都存在手机依赖、电脑依赖,越来越多的上班族患上了“电脑失写症”,离开电脑不会写字了。网络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改变着思维的方式,快餐式的浏览正在催生出功利的阅读;“万事不决问‘百度’”,临时抱佛脚、盗版式的知识积累与运用,大有电脑内存替代人脑储备的势头。说到底,信息技术的引入,很容易让人做了工具的奴隶而非主人,想想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缺少自控能力的孩子呢?

“电子书包”利弊分明,牙尖而盾固,争议难止在意料之中。但是,信息社会有利而用之,是挡不住的潮流,因噎废食并不可取,而应是如何趋利避害,让其需要而不依赖。关键是要顺应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更重视孩子人文素养与内在能力的培养,而不能在技术依赖中迷失。

一方面,“电子书包”的应用应当予以限制,功能不宜过于强大,在教学中处于辅助地位;另一方面,对传统课堂有益的要保持,并对孩子的阅读、书写、运动以及实践等环节应加强。此外,“电子书包”也应抓好管理,不能泛滥成为孩子的玩具。